

1980

1979

1980

1978

1977

1976

1975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Friendly
Sino-Japan Communication (1978~2008)
Politics

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

政治卷

王新生 ◎主编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Friendly
Sino-Japan Communication (1978~2008)
Politics

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

政治卷

王新生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 (1978 ~ 2008) 政治卷

主 编 / 王新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杨 群

责任编辑 / 苏 君 徐辉琪 徐思彦 宋月华

责任校对 / 李 烨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2

字 数 / 373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417 - 2/D · 0169

定 价 / 128.00 元 (共三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30年前的1978年，中日两国通过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条约的形式把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固定下来，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这一条约与中日复交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一道，成为奠定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础，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自从2006年10月，经过中日两国领导人的“破冰”、“融冰”、“迎春”之旅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8年5月6~10日又成功地对日本进行了“暖春之旅”，并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共同签署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份被称为中日之间的第四份重要政治文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必将进一步巩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增进中日两国的战略互信，构筑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总体框架，并全面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上述《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不仅继承了中日之间已经存在的三个政治文件，即复交时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并且根据中日关系的新发展，确定了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指导原则，规划了两国关系的

未来，而且也可以说是30年前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新的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下的继续和发展。

30年以来，尽管世界形势和中日关系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和平友好条约本身不仅没有过时，相反地对当前和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条约的核心之一就是和平、友好，在21世纪的今天，中日两国应从大局出发，继续坚持和平、友好的大方向，这是丝毫也不能动摇的，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与福田首相会谈时所说的那样：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日两国必须走和平、友好、合作的道路，这是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与此同时，中日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也至关重要。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包括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及国际事务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增进政治互信”。为此，要求中日双方恪守各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这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关键，是确保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政治前提与政治基础。目前中日关系重现活力、重新进入良性循环，各个领域都明显地呈现出改善和发展势头，保持这一得来不易的成果，是两国之间的共同愿望。但无可否认，中日关系仍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也存在着变数，需要进一步巩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日经济贸易关系，是中日战略互惠的集中体现，也是全球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中日经济的互相依存和互补性，是构建良好的中日关系的坚实基础。在贸易方面，从1993年到2003年，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日本已成为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作为东亚地区的两个重要国家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和日本推进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不仅有利于这一地区的和平与

振兴，而且也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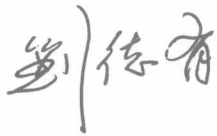
长期以来，日本是与中国开展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国家，交流形式、种类和项目总数一直居于首位。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始终没有间断，成为沟通彼此心灵、联系人民友谊的坚实纽带。特别是在2007年举办的“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全年活动多达近百项，涵盖了文化、体育、旅游、媒体、影视、青少年等诸多领域，其意义重大而深远，进一步推动了两国传统的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年来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值得总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三卷本中日交流30年的专集正是出此目的，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该专集作为面向民众的非纯粹学术性著作，也是出于为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顺利发展而奠定国民感情基础的目的。因此，出版方面盛情邀请作序，欣然从命。

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名誉会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原副部长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刘永' (Liu Yong).

2008年10月

日本国内关系与中日关系

目 录

总 论

总 论	3
-----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21
---------------	----

中国领导人与中日关系

邓小平与中日关系	35
----------	----

江泽民访日与《中日联合宣言》的发表	46
-------------------	----

胡锦涛访日与《中日联合声明》的签署	56
-------------------	----

邓颖超与中日关系	65
----------	----

胡耀邦与中日关系	73
----------	----

中国总理访日	82
--------	----

日本政党与中日关系

自民党与中日关系	91
----------	----

公明党与中日关系	101
----------	-----

社会党（社民党）与中日关系	111
---------------	-----

日本共产党与中日关系	120
------------	-----

民主党与中日关系	129
----------	-----

日本历届内阁及天皇与中日关系

福田赳夫内阁与中日关系	139
大平正芳内阁与中日关系	147
铃木善幸内阁与中日关系	155
中曾根康弘内阁与中日关系	162
竹下登内阁与中日关系	173
宇野、海部内阁与中日关系	182
宫泽、细川、羽田内阁与中日关系	190
村山、桥本内阁与中日关系	200
小渊、森内阁与中日关系	210
小泉纯一郎内阁与中日关系	217
安倍晋三内阁与中日关系	228
福田康夫内阁与中日关系	237
天皇与中日关系	246

政府交流机制

中日议会交流	257
中日政府成员会议	266
中日战略对话会议	275
中日外交事务当局定期协商	284

军事交流

中日防务高层互访	293
中日部队与人员交流	304
中日安全磋商机制	311
1978 ~ 2008 年中日政治交流大事年表	318
参考文献	337
后 记	341

1978~2008
[政治卷]

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

总 论

总 论

杨红军 王新生

自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来,尽管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交流持续不断,但也出现了曲折与波动。概括地讲,中日政治关系大体上经历了1978~1995年的平稳发展、1996~2006年的摩擦对立、2007年至今的迅速恢复等三个阶段。

一 平稳发展阶段

如果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积极推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主要目的是突破西方阵营对中国的封锁、减轻来自苏联的压力,那么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国领导人努力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更多的是着眼于改革开放、经济现代化。具体地说,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日本的资金与技术,日本的经济需要中国的资源与市场,由此产生的各自利益需求推动两国关系较为顺利地发展,尽管也存在某些不和谐的因素,但均能得到较好的处理。从时间上看,这一阶段从1978年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到1995年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出任政府首相的村山富市内阁。

作为“官僚派政治家”,福田赳夫缺乏政治性决断的魄力,自民党内田中角荣与福田赳夫相互争斗的“角福战争”也使其无暇他顾,但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领导人的努力、美国的认可,终于在福田执政时期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

1974年中日“贸易协定”、“航空协定”、“海运协定”签订以后,两国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中国不仅成为日本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更是其在亚洲最有潜

力的市场。一方面，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要求两国缔结长期贸易协定；另一方面，早日缔结长期贸易协定，也将有利于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为此，中日政府开始了相关条款的谈判。1978年3月，《中日长期贸易协议》在北京签订，它使中日两国之间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加深了联系，在中日交流中筑成了一条宽阔的经济渠道，也对人们正在为之努力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时任福田内阁外务大臣的园田直对此评价说：“从睦邻友好的立场出发，我高度地评价它。我认为，以此为开端，将会对日中条约产生良好影响。”日本时事通讯社在对此事发表评论时说：“迄今日中关系一直是经济领先于政治，因此缔结日中条约的条件更加完备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长期贸易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全面的日中交流的新时代已经揭开了序幕。”进入1978年以后，中日经济合作已经十分广泛和稳固。日本的很多大中型企业与中国建立了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关系，一些没有建立这种关系的企业，也出现了合作的意向和行动。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后，非常关心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认为这是完成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未竟的事业，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应积极促进恢复搁置数年的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同年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滨野清吾率领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说：“福田首相表示要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我们对他寄予期望。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如果仅就缔结条约这个问题来说，一秒钟的工夫就可以解决。”“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字。”1978年5月3日福田首相与美国总统卡特会谈时，卡特表明美国立场说：“中日和平条约……希望能更积极地进行”，“作为美国来说，反对霸权不存在问题”，并预祝中日缔结条约成功。美国对中日缔约的积极态度，无疑对促使福田首相下定决心推动中日缔约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福田政权之后的大平政权时期，中日政治关系发展更为顺利。作为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的外务大臣，同时主张在亚太地区发挥日本独特作用的大平正芳，在担任首相期间自然积极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在大平内阁时期，首先是中日两国建立起了高级事务级定期协商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最先由大平首相在访华期间提出，得到中国方面的积极响应。1979年12月6日，随同大平首相访华的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与中国外长黄华就定期协商达成了协议，即中国国务院成员和日本内阁成员以及两国外交事务当局高级官员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在东京和

北京轮流召开，从而为中日两国定期交换意见和情报建立起了新的渠道。1980年12月，中日首次政府成员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根据讨论问题的需要决定参加会议的成员，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进行协商。到1987年，共召开了五次这样的会议。

大平政权还积极支持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建设，中日经济合作从“民间级”发展为“政府级”。大平正芳第一次组阁是在1978年12月7日，11天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在这次极具历史意义的会议上，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调整，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会议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其中日本无疑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进行合作的首选国家。1979年5月，邓小平副总理在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就谈到中国借鉴日本现代化经验的问题，明确提出：“我们现在决心搞四个现代化，但我们的知识确实不够，特别是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

在大平正芳首相的主导下，日本政府决定在1979~1984年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贷款3300亿日元，并确定1979年度的贷款额为500亿日元，年利率为3%，偿还期限为30年，其中含宽限期10年。该批日元贷款用于6个大型建设项目，即山东日照石臼所矿石专业化深水码头、秦皇岛港二期煤码头设备、山东兖州至石臼所铁路、北京至秦皇岛复线电气化铁路、衡阳至广州复线工程、五强溪水力发电站。1979年3月，中日双方同意将期限为1978~1985年的《中日长期贸易协议》延至1990年，并将原定的目标金额再增加1~2倍，即双方出口200亿至300亿美元。日本政府还决定对中国的产品提供“特惠关税”。

作为过渡性政权，1980年7月成立的铃木善幸内阁持续时间不长，但还是妥当地处理了1982年的“教科书事件”，保持了中日政治关系的友好气氛。接下来的中曾根康弘长期政权为实现“战后政治总决算”基础上的政治大国目标，对外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对内积极推行改革，特别是强化国家主义的思想文化措施，致使“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第二次教科书事件”、“光华寮事件”等问题的出现。但在两国政府的努力下，这些问题没有影响到中日关系正常发展，而且3000日本青年访华、4700亿日元的第二次对华贷款等依然显示两国关系的友好合作性质。另外在中曾根执政的近五年内，两国首脑互访有三次。第一次是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应邀访问日本，访问了日本的6个主要城市，并与中

曾根首相和裕仁天皇会谈。中曾根首相在 1984 年 3 月和 1986 年 11 月两度访华；在 1984 年访华时双方再次确认了中日关系四原则，商谈成立“中日友好 21 世纪委员会”。

1987 年 11 月竹下登内阁成立后，接连重申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的原则立场，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1988 年 8 月 25 ~ 30 日，适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10 周年之际，竹下首相偕夫人来华访问。出行前，竹下首相对中国记者发表谈话，强调“重视中国是我国外交的重要支柱。我国的想法是：按照日中联合声明、和平友好条约和日中关系四原则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8 月 25 日，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竹下首相一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后，双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竹下首相再次强调“日中友好是日本外交的主要支柱之一”，重申“日本政府以对过去历史进行严肃反省为出发点，以日中联合声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及日中关系四项原则为依据，继续重视和发展日中关系的政策不变”；对光华寮问题“将按照‘一个中国’原则予以对待”；为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给予力所能及的合作，宣布“日本政府将从 1990 年开始的六年间向中国提供约 8100 亿日元的新的政府贷款”。此次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主要用于建设水力发电站、宝鸡至中卫铁路、六处港口扩建、云南化肥厂、引黄水渠等与发电、铁路、港口和农业技术改造有关的 45 个项目，比总额为 4700 亿的第二批对华日元贷款增加了 70%。“从全世界来看，这将是一项无先例的经济援助额”。

1989 年 6 月，中国发生北京“政治风波”，西方国家纷纷表示制裁中国。刚刚上任的宇野宗佑首相在国会答辩中表示，在采取制裁措施问题上，必须意识到日中关系和日美关系截然不同，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不应该以情绪代替理智。7 月 10 日，宇野首相再次表示，日本政府不同意制裁中国。在 7 月中旬于巴黎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宇野首相发言时主张不应该在国际上孤立中国。同年 8 月成立的海部俊树内阁仍然执行宇野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继续保持接触并发展中日两国关系。8 月 11 日，首相官邸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海部首相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关于今后中日关系的提问时表示，中日两国交流历史悠久，两国将根据《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发展长期友好关系，中国永远是重要的邻国。对于中国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日本将善意地予以合作，为两国关系更深入地发展而努力。日本政府决定解除对日本人访问北京的限制，并表示关于第三次日元贷款等经济合作项目将在观察世界金融机构和中

国经济的动向后做慎重研究。10月4日,海部首相在国会就中日关系回答议员的提问时表示,中国只要不改变改革开放政策,日本对华合作还要进行。12月5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近50亿日元的1989年度无偿援助款项文书在北京正式换文。12月7日,中日文化交流的政府间协商在北京举行,一度被冻结的两国文化交流事业得以恢复。1991年上半年,两国高层政要实现互访,为中日关系的全面恢复正常奠定了基础。这年1月8日,日本大藏大臣桥本龙太郎访问中国,这是1989年6月以来访华的首位日本内阁成员,日本也因此成为北京“政治风波”后第一个恢复同中国高级接触的西方国家。3月21~24日,日本通产大臣中尾荣一访华。5月8~12日,中国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回访日本。两国外长也在1991年上半年实现了互访。4月5~7日,日本外务大臣中山太郎访华,这是日本外务大臣自1988年以来首次正式访华。钱其琛外长在与中山外务大臣会谈时说,中山外务大臣的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进一步恢复。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于6月25日回访日本,同中山外务大臣就海部首相访华、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以及日本天皇访华等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1991年8月10日,海部首相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将恢复两国正常交往的过程推向完成阶段。访华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分别会见了海部首相,李鹏总理同海部首相举行了正式会谈。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广泛而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两国高级领导人进行互访并分别举办一系列文化纪念活动。海部首相还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发表了题为《新的世界和日中关系》的演讲。在演讲中,海部首次提出了“亚洲中的日中关系”、“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概念,标志着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进入了从过去立足于两国双边关系转变为立足于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新阶段。

1991年11月5日宫泽喜一内阁成立。宫泽首相多次表示新内阁将继承海部俊树内阁“世界中的日中关系”方针,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推动日中关系的发展。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1992年中日两国政府组织并举行了一系列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活动,实现了高级别的政治对话,将中日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应日本国政府的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4月6~10日对日本进行了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在中日恢复邦交20周年之际实现日本天皇访华,是中日两国政府经过长期

探讨达成的共同意向,在1991年日本政府恢复与中国的高层接触后,具体的天皇访华计划就提到了两国的议事日程上。日本政界的一些保守派人士,特别是自民党内不少议员的担心和反对,使日本政府在天皇访华问题上迟迟不做出明确的答复。不少人出自对中日间存在的战争责任和战争赔偿、慰安妇、钓鱼岛等问题的疑虑,担心天皇访华可能会引起天皇战争谢罪问题,以及以何种措辞对过去表态的问题。直到1992年8月初,自民党内仍然有33人联名要求天皇延期访华。尽管如此,宫泽首相还是决定利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大好时机,开展皇室外交活动。8月10日,宫泽首相会见自民党主要领导人,表示他已做出最终决断,实现天皇陛下同年10月访华,希望自民党对此给予合作。8月25日,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天皇、皇后将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邀请,于1992年10月正式访问中国。明仁天皇对中国的首次正式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达到了加深相互理解、促进睦邻友好的目的,有力地推动了冷战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宫泽首相的决断,实现了中日两国两千年交往史上天皇首次访华这一具有象征意义和开创意义的“历史性的大事”,是对中日关系的一大贡献。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内,日本政局出现混乱,首先是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下台,自民党及日本共产党之外的八党派在1993年8月组成细川护熙政权,然后是羽田孜少数派政权,受到排挤的社会党在1994年6月与自民党、先驱新党组成联合政权。即使在此背景下,中日关系仍然得到正常发展。例如1994年3月,细川首相访华并与中国政府领导人会谈,强调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中日关系,愿意继续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现代化建设;在羽田政权时期,内阁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谈话发表后,羽田孜首相立即表示永野的讲话是不适当的,并表示“在深刻反省历史的基础上,为创造和平和建设亚太地区的光辉未来而尽力,这才是日本应该走的道路”;1995年5月2~6日,村山富市首相受李鹏总理的邀请访问中国,并参观了位于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是日本首相首次来此参观。参观结束时,村山首相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写下留言:“正视历史,祈中日友好、永久和平。”

二 摩擦对立阶段

冷战结束,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中日之间共同面对的战略威胁消失。与此

同时，尽管处在泡沫经济崩溃以后的改革时期，但日本保守政治家们的政治大国梦想并未消失，借助“中国威胁论”增加军事力量、扩大防卫范围、增加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就成为日本政府的努力目标。在经过短暂的下野后，重新执政的自民党首相桥本龙太郎在中日政治关系方面也作出努力，除两国首脑互访外，高层互访频繁，中方访日的有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作为国防部长首次访日的迟浩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等，日本访华的高层人士有竹下登、海部俊树、细川护熙、羽田孜等前首相及外务大臣池田行彦、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等。中日两国外长在各种场合举行会谈，仅1997年就有6次。

尽管如此，1996年4月16日，桥本首相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联合宣言》，强调两国将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不测事件时加强防卫合作，并宣布就此对1978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修改。1997年9月23日，日美两国在华盛顿签署《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特别规定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紧急事态时，日本向美军提供后方支援。有关“周边地区”的范围，此前内阁官房长官梶山静六在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明确表示“周边地区”“理所当然地包括台湾海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对此进行强烈的抨击，但桥本首相依然含糊其辞，一再强调“周边事态”着眼于事态的性质，而不是地理概念。另外在1996年7月29日，桥本首相借口自己的生日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日本首相时隔11年之后再次公开参拜靖国神社，此举立即在日本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深表遗憾。

1998年7月12日，日本举行第18届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在参院的席位未过半数，党总裁及政府首相桥本龙太郎引咎辞职，其后小渊惠三当选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1998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10月22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中日友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进行庆祝活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等出席了招待会。

1998年11月25日，江泽民对日本进行为期6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历史上第一次访问日本。江泽民在成田机场发表书面讲话时指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之际，中日关系正值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认真总结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对发展未来的两国友好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11月26日，江泽民出席了日本国明仁天皇在东京迎宾馆前庭广场举行的隆